

## 第 11 章 再论中国的水问题

近来，水作为地球环境的新问题受到极大关注。一些有识之士认为，20 世纪围绕着领土和地下资源展开了争夺，而 21 世纪人们将会为争夺水源而战。说到水，每每必提黄河断流问题，堪称典型案例。每当电视播放黄河水流完全终止、河床干涸龟裂画面时，也许会有人感到震惊。

电视里报道的多半是黄河下游，实际上中上游的干燥地带、半干燥地带的缺水问题更加严重，大同可以说是一个典型。1999 年秋天，《大同日报》曾报道过，“29.7 万人面临饮水困难。”当年 4 月又报道，“每年地下水位下降 2~3 米，2008 年水将枯竭。”

在我们的据点环境林中心，79 米深的水井已经不出水了。我们又急急忙忙打了一口井，井深有 140 米。地下水源大面积枯竭已成为不争的事实。

在我们 1999 年底实施的民意调查中加入了关于水的内容，调查对象为 7 个县 21 个村的 900 个人，调查答案令我们感到意外。

- A. 用水充足，也可以灌溉。 42.6%
- B. 生活用水充足，但不能灌溉。 47.4%
- C. 喝的水不缺，但要节约才行 18.3%
- D. 喝的水不够，需要到外村取水。 3.6%

也许有人会认为只有 3.6% 的人缺水算不了什么。为此我们询问了一个家庭一天的用水量和家里的人口。以“一担水”为水量单位做调查。大同农村的一担水有 45 升，相当于日本的“一荷水”。21 个村每人每天的用水量为 23.8 升，少的村子只有 15.6 升。

所用的水只有这么一点点。我们的水洗厕所冲一次至少也要 10

升，据说一般的需要 12 升。也就是说他们每天的生活用水是我们每人每天冲两次厕所的用水量，而且其中还包括了家畜的饮用水。一个 4 口之家一个月的用水量不足 3 立方米。

其后的问题是，最近水是增加了？还是减少了。

61.5% 人的回答是水减少了，而且这种趋势扩展到大同市整个区域。回答水增加的人集中在特定的村子，说明有一些特殊原因。5 个村子中遇驾山、李二烟、吴城位于丘陵地带，本来就缺水。这里的人大部分回答水减少了，说明危机状况继续加剧（参见下表）。

农村的水使用量(人/日, 单位/升)

整体	遇驾山	随土营	李二烟	吴城	上北泉
23.8	15.6	24.5	31.0	16.6	21.4

水增加了还是减少了 (%)

	整体	遇驾山	随土营	李二烟	吴城	上北泉
增加	15.4	3.3	6.5	12.0	2.0	18.0
减少	61.6	70.0	21.7	84.0	85.7	44.0
没有变化	22.4	16.7	32.6	0.0	0.0	48.0

另一方面，从日本看中国的发展异常迅猛，北京就是一个象征。每次往返大同路过北京时都对其发生的变化感到惊讶。但是从大同看北京的背影，仿佛是沙中楼阁。

大同是北京的水源地。发源于山西省西北部管涔山脉的桑干河由西向东流经大同的中部，然后进入河北，流入官厅水库。官厅水库和密云水库是北京仅有的两个“水缸”。上游大同没有水，官厅水库的



---

图：北京的水源桑干河没有水。农民在河川地耕地、播种。水源不足已成为中国中纬度区域严重的问题。

---

水量减少，水质恶化，据说密云水库的水量也在下降。

由于地表水已无法满足北京的用水，只好开始大量开采地下水。我所看到的资料上介绍，80年代北京、天津地区可利用的地表水为60亿立方米，90年代减少到50亿立方米。目前利用地下水已达70亿立方米，约60%的用水依赖于地下水。

为了开始筹备绿化合作项目活动，我们在1991年调查了北京郊区的顺义县，当地的人告诉我们：“以前5米的地下水位已经下降到40米，还出现了盐碱灾害。”不知道那里最近10年的情况如何？

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的创办人莱斯特·布朗(Lester R. Brown)曾

指出“1999年北京的地下水位下降了2.5米，从1965年算起，北京的地下水位下降了约59米。随着有水层枯竭，中国的水资源不足问题重新抬头，将向中国领导层敲起警钟。”（引自网络消息《警钟》）。

世上大多矛盾总是最先在边境的贫穷地带开始显现，环境问题最具代表性。其实日本也是一样，水俣病、大骨节病等即典型事例。

前面已经介绍，进入90年代大同的降水模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春季雨水减少，夏季导致水土流失的雨水和农作物长成后的雨增多。虽然全年降雨量没有大的变化，但是微小的变化却给当地的农业带来致命的打击。（参见P22“大同地区月降水量的推移”）。

如果这种现象是地球变暖带来的结果，那么今后有可能会变得更加严重。这种变化同样发生在工业发达国家和富庶地区，但因有缓冲余地，尚不会立刻显现出来。在那里，地球变暖问题还只是未来的话题。但是，在本来已达极限的黄土高原农村却已经是迫在眉睫的现实问题。

水的问题也是如此。在大同地区，首先是县交界附近的贫困农村的井和泉眼干涸了，然后向其他村庄和城市蔓延。近几年来，除了下雨之后没有看见过有流水的河流。水库也枯竭了。在此我还要重复：大同是北京的水源地。

## 被截流的黄河

2001年4月，在大同逗留期间我们利用一点时间去观察了黄河。我们访问的地方是山西省偏关县万家寨镇，位于山西省、陕西省、内蒙古自治区交界处，对面就是鄂尔多斯。从地图上看此段黄河几乎形成直角走向。

黄河的观光胜地并不在这里。司机小张说：“既然看黄河，莫不如去壶口。”壶口有瀑布，黄河奔流咆哮，气势恢宏。但是我仍然选

择万家寨自然事出有因。

一路盘山越岭，绕着大弯一直走到黄河。车刚一转弯，最初映入眼帘的黄河被水库隔断了。水库看起来似乎不大。

25年前我曾经在河南省郑州市附近看过一次黄河。黄色的浊流卷着旋涡流淌着，河对岸一片苍茫。我一边追溯当年的回忆，一边感慨“难道这是当年的黄河吗”？可你不要小瞧它，只是因为景观一望无际，黄河显得有些渺小而已。我数了数吊桥上钢索的间隔距离和钢索，推算河的宽度大约有500米。毫无疑问，这是一条大河。

另外一点感到不可思议的是水很清澈。相马先生曾经看过离此地很远的上游，他说“上游的水是黄色的”。流过来的水也是同样的水，只不过被水库拦截后泥沙沉淀，水变清了。也就是说，库底堆积着泥沙。当然会有办法解决，但是我这个外行人还是免不了担心。

这个水库主要有两个目的。一是发电，实际上好像已经开始发电了。另一目的是为全国水源最缺乏的山西省供水。计划首先为山西省省会太原供水，其次是为第二大城市大同供水。按预定计划太原部分应该已经完成，但工程进展不很顺利。所发的电用于提高泵压。

建设资金使用的是世界银行贷款，国内也发售了建设债券。听说大同事务所的人都响应工作单位的号召购买了债券。也许是一种心照不宣的强制，但对该项工程也有一种期待吧。

因为是截流，不知道到底有多大流量。从一般常识来看，应和溢流到下游的水量差不多。但是实际上水量少得可怜。河里的石头露出了水面，似乎人可以踩着石头过河。

我说：“你们不要期待水流到大同啦。”其他人赞同我的观点，只有司机小张说：“不用担心，现在对水管理得很严，黄河从去年开始就没有出现过断流。”

大同的领导也很担心这一工程：“工程完工后水真的能供应给大同吗？即使提供，水价如果太高，大同的产业能用得起吗？”

要想从这里引水，还有竞争对手陕西省、河南省、河北省、山东省。如果从经济实力上看，山西省几乎没有胜出的可能性。当向曾在中央负责环保部门的领导谈及此事时，他漫不经心地回答“那水大同不能用”。也许那水只是通过大同供应北京而已。

当前中国正在大力强调“西部大开发”。如果西部大开发受挫，东部沿海地区和内陆地区的差别就会扩大，对社会稳定带来影响。如果取得成功，上游的用水量一定会增加。那样就会出现上下游争夺水资源的局面。

## 争夺云彩

2001年8月，在大同逗留一个月后经由北京回国。这一次我乘坐的是白天由大同至北京的火车，主要是想广泛地观察一下这次空前的干旱状况。

灾情相当严重。这次考察的大同县、阳高县虽然灾情严重，但是东面的天镇县更加严重。其他几个县的山还多少有点泛绿，而这里的山却满眼都是黄土的颜色。

广袤的黄土高原，降雨情况变化多端，过一个山头，情景就会变得完全不同。7月24日，南郊区的环境林中心在40分钟之内下了48.3毫米的大雨，院子变成了水塘，苗圃也被雨淹了。同一时间段，喜鹊林只下了5毫米的雨。二者之间的直线距离只有30公里，中间也没有山。

问题变得如此复杂是有一个因素是采取人工降雨。如果有云，具备了降雨条件，就会向天空发射形成水滴核物质的碘化银之类。环境林中心下大雨时一开始也是星星点点，后来就听到了几声轰鸣声。

话题重新回到我从车窗看到的情形。列车过了天镇县，进入河北省张家口市的农村地带，眼前的干旱状况更加严重，已经长到一人高

的玉米叶子变得枯黄。天镇县从一开始就已经放弃，既没有播种，也没有耕作。河北省枯黄的庄稼给人的视觉冲击更强烈。但实际上，连种子都无法播种的地方，干旱情况当然更严重。

同样的张家口市，其东部的情形大不相同。东部海拔下降，还种水田，相当富裕。进入北京之后，农作物和树木都生长得不错。这到底是为什么呢？远田先生曾不止一次地提出过疑问。到了北京一打听才知道北京下了不少雨，而且是人工降雨，据说有报道说这是“科学的胜利”。听说北京环境志愿者网络的会员们都在议论“那些雨云本来应该给那里带去雨的”。

在大同有一个说法“云由东向西移动就会下雨”，也有的说“东风一刮雨就来”。西面来风都是干风，与下雨无缘。东面的风和云带来的雨也许是来自于海洋。原本应该给大同带来雨水的云也许被北京和天津的人工降雨给阻隔了。如果是那样的话，在争夺水源之前就是争夺云彩。

## 制约发展的“水”

我写的是大同的事。读了这些很多人会认为写的是偏远内陆的事。实际上大同离北京只有 300 公里，与北京仅一市之隔。北京旁边的城市是河北省张家口市，紧挨着的就是山西省大同市，所以 2002 年 11 月高速公路全线开通之后，北京至大同之间只需要 3~3.5 个小时。如果开辆好车，有两个多小时就到了。

大同市是继山西省省会太原市的第二大城市，人口 300.3 万，面积 14176 平方公里，大体相当于大阪府、京都府、兵库县的总和。提到市，大家的印象可能是城区。虽然这里的市也包括城区，但大部分是农村、山村。前面所写都是实情。

按照中国政府的政策，西部大开发正在全面展开。山西省既不属

于东部沿海地区，又不属于西部地区，所处的位置“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大同地区的年轻人对此现状非常不满。

比如，作为北京水源地的桑干河附近住的农民不能使用该河水进行灌溉。实际上这条河流几乎常年无水，处于干涸状态。

大同使用丰富的煤炭资源进行火力发电，规模最大的第二发电厂所发电力全部输送到北京、天津。在街上遇见的人对我说：“发出的电送往北京，留给大同的只有污染。发电需要大量的水，因此地下水越来越枯竭。”我觉得挺有意思，想用摄像机把他的见解拍摄下来。不料对方立刻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北京是中国的首都，支援北京是我们大同市民的光荣任务！”

我觉得大同好像是北京的附属地，山西省是“后娘养的孩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大同属于察哈尔省，之后察哈尔被一分为三，张家口划归河北省，大同划归山西省，集宁划归内蒙古自治区。据说被划归山西省后煤炭作为基础产业的年代，大同比较受到重视，但是当煤炭价值下降以后，情况就发生了变化。

日本人对中国的认识很偏，只了解北京、上海、广州等沿海大城市的情况，对内陆地区的情况几乎一无所知。不过这也在情理之中，因为平常也没有什么关系，就连中国人也有好多不了解内陆农村的情况。

于是在日本就有这样一种论调——中国已经那么富裕了，相比之下，日本现在很不景气，经济正处于“卡脖”阶段，中国方面还要拉后腿。日本有必要对中国进行经济协作吗？

然而，中国的问题并非那么简单，比如说水的问题就直接关系到粮食问题。我看到日本报纸上有一篇评论，说中国的粮食生产已经过剩，正在寻求从量向质的方向转换。这种看法未免太片面。

中国靠只占世界 7% 的耕地养活着占世界 22% 的人口。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相比，人均耕地面积减少了 45%，而人口增加了 2.4 倍。



耕地不可能说增就增，最近还有所下降。尽管如此，过去曾经有过饿死很多人的现象，而现在已经基本解决粮食问题。

粮食生产飞跃发展的原因是什么？土地制度的改革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从封建地主制经过合作化生产，转变成个人承包制，由此调动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解放了生产力。再加上品种改良，稻米已经实现了一代杂交。化肥和农药也起了很大作用。

但是更重要的是完善了灌溉系统，恐怕还没有一个像中国这样彻底实施灌溉的国家。这一点对粮食生产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据说每生产 1 吨小麦和玉米需要 1000 吨水，若是稻米需要 4000 吨水，谷物等也是用水灌出来的作物。

访问大同的日本年轻人说：“到这儿以后深感水的重要性，回到日本以后要努力节约水。”“不对，日本水源丰富，应该多用水。”我这么一说，大家感到很茫然。“应该提高日本的粮食自给率，使用日本的木材。世界上水源最丰富的日本大量地进口这些需要水的物质是没有道理的。”得，我的话又跑题了。

黄河断流的最大原因是灌溉而大量取水所至。据说在华北的粮仓地带，地下水每年下降 1~1.5 米。在中国粮食生产占重要地位的华北平原，水源正在枯竭。过去支撑粮食发展的灌溉难以为继。

以水为基础考虑生产率，农业只有工业的七十分之一。中国从农业向工业化转型是经济发展的趋势，同时也是为了摆脱水制约的一种苦肉之策。北京、天津、华北的部分地区好像已经在讨论放弃部分农业，将剩余的部分水用于城市生活和工业生产。

制约中国今后发展的最大问题就是以水为中心的环境问题。讨论所有中国问题都不能避开环境问题。

## 北京的背影是沙中楼阁？

2004年4月20日~22日，中国共产主义共青团、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在北京主持召开了“日中水论坛”研讨会，我也在会上做了题为《北京的背影是沙中楼阁？》的发言。从博得了中方与会者的掌声来看，应该说参加这个会议的人当中有不少人已经发现了这个问题。

我们绿色地球网络从1992年开始在山西省大同市的农村开展绿化合作项目，我每天在农村东奔西走，日晒和酒的功效使我变得黝黑。这一带的水像漏底的水缸在迅速减少，一种与其说是危机不如说是恐怖的感觉油然而生。

最早发现的是县与县交界的农村地带，井水和泉水都已干涸，需要到几公里以外的地方担水吃。我们实在看不下去了，于是帮助两个村子打了水井。幸运的是两口水井都出了水，可是一口井的深度是176米，另一口井的深度是183米！村里的人皆大喜。老人们拉着我的手不放，哭着说：“真想不到在我有生之年还能碰见这么大的事。”结果把我也给弄哭了。

因打井认识的打井队队长的话对我的冲击实在太大了。

“地处临近县界的地带都没有水了。我们最清楚没有水的日子有多难，所以即使不赚钱也想替他们挖井。可是，缺水的村子大都穷得叮当响，哪有钱来打井！没有打井订单，我们的工资也被一拖再拖，只能干着急。”

如果是那样的话，打井只是一种应急措施，但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这里的缺水问题已经远不是打井就能解决的了。

另外发现的一个问题是，大同的所有河流、水库都已干涸。桑干河横穿大同中部，我最后一次看到河里流水是在1997年夏天。在那以后我每年都要路过这条河10次以上，但是再没有看到流水。最严重的一次是在应县过这条河时看到河底全都变成了玉米地，根本没有流水的地方了。如果不是看到桥的话，谁也不会想到这儿曾经是一条

河。当地的农民们既不期待、也不怕水流过来。丁玲写过一本著名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可现在这里变成了“太阳照在玉米地上”。

城市的缺水问题也很严重。2003年9月我拜访了大同煤矿职工的住宅。自来水每天只供应20分钟，存在浴缸里的100升水就是一家4口人一天的用水。

地下水位也在急剧下降。据当地报纸报道“主要地区的地下水位每年以2~3米的速度下降。2008年将完全枯竭”。

中国这么大，出现这种问题也不足为奇。但是大同是北京的水源，刚才说到的桑干河就是注入到官厅水库的水源。官厅水库和密云水库一样，是北京仅有的两个“水缸”之一。

大约一个月前，我在去大同途中的高速公路上下车看了一下官厅水库。水位从原来的地方后退了许多。干涸的库底也变成了农田，农民正在忙着春耕。有苹果、葡萄果树园，还有柳树苗圃。水边还有贝壳的尸体，水草已经腐烂。农民说：“最近五六年水位下降得很快”。

2003年国庆节前夕，大同的册田水库开闸，向官厅水库输送了5000万立方米的水。在当时的仪式上强调“为首都做贡献是光荣的任务”。但是，大同缺水的状况要比北京严重得多。从大同的角度看，北京用水实在太浪费。不知北京人是否了解大同人是以怎样的心情送走这5000万立方米水的。

从日本来看，北京正在高速发展，我每次路过北京时都为其变化感到吃惊。但是从大同看到的北京背影犹如“沙中楼阁”。中方也做了很多相关方面的报告。在此我向节水及其他水利工作者表示敬意。但是如果北京继续以目前的态势发展，节水也只能是杯水车薪。

我也知道，作为外国人如此说三道四，过于无礼。但是每年都在大同逗留100~120天的我却不能不一吐为快，这一点希望大家能够理解。

我们的本职工作是种树，也多少做了一点与水有关的事。刚才说

过我们在农村打了水井，此外我们还在自己的据点环境林中心建设了一个小型污水处理设施。那里有 20 公顷的苗圃，种树苗需要水。我们在日本外务省“草根无偿援助资金”的援助下打了水井，但是在地下水位急速下降的今天，我们也不能乱用地下水。于是想到将煤矿住宅的污水净化后加以利用。

日本大阪产业大学的菅原正孝教授自费来到我们的现场。我们采用的技术是土壤净化法。用 25 米泳池大小的简易设备，每天可处理 250 立方米的水。因为我们用处理后的水饲养着金鱼，所以说明这些水完全达到了灌溉用水的标准。许多人来看过后都说：“如果这么简单的设备就可以达标，我们也想马上搞。”实际运行后还有地方需要改进，目前我们正着手这项工作。

因为我们只考虑了灌溉用，所以这套设备在冬季气温近零下 30 摄氏度时无法运行。如果冬季也能运行，用途将更加广泛。在人口密集的城市里，大规模的处理设施很有效，但是在人口密度低的农村地带，如果能够在污水排放源的附近建设很多小规模的处理设施，将处理后的水排放到河流中效率更高，这样河流也就可以得到恢复。

项目的成功使我们尝到了甜头，从去年秋天开始我们试验将矿山污水进行净化。大同是中国最大的煤炭城市。坑道挖得深，自然就出地下水。因为水中含有铁、锰和其他物质，不能直接使用。因此便被废弃了。据说，平均每挖 1 吨煤要破坏 2.5 吨的地下水资源。最近中国也启动了将水净化后用于自来水的项目。由于使用的是逆渗透法，需要大量资金，所以，只是有实力的大矿山企业能采用，中小煤矿与它无缘。

我们采用的是生物处理方法，用铁细菌处理污水。这个设备虽然小得像个玩具，但一天能够处理近 70 立方米的污水，可充分满足 800 人村庄的用水。设施运行了 3 个月，离自来水的标准还有些差距，但洗衣服、洗澡用完全没有问题。煤矿工人从矿里出来浑身上下全是煤

尘，如果能够洗个澡，那该有多舒服啊。

然而，这项试验却不得不在3月份中断了，原因是煤矿被关闭。在通告颁布的第二天，根据上级的指令入口被封闭了。我们好不容易积累起来的成果就这样夭折了，感到十分遗憾。但是地方的要求非常强烈，所以我们还希望能够重新上马试验。类似这种麻烦事在地方时有发生，过去也有过这方面的体验。希望日本的各位在发生这样的情况时不要着急，也不要气馁，向中方提出要求尽快解决问题。

大部分社会问题首先在贫困的边境地区显现。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地区都是一样。环境问题、水问题最为重要。如果全社会随时关注这个问题，就会及早发现，容易得到纠正，负担也会减少。

中国有句格言“吃水不忘挖井人”，这句话说得好。但是我想再加一句话，“吃水不忘上游人”，反过来，排污也应不忘下游人。

## 环境意识的变化

我考虑在中国开展绿化合作是在1991年的夏天。我第一次访问中国是1971年，之后每隔两三年去一次中国。一开始我从没有想过中国的环境问题会如此严重。

“中国以‘为人民服务’为原则，不存在公害问题。”“废物也被当作有用的资源加以利用。”这样的观念深深地渗透在我的脑海里，当时的我完全没有理解环境问题的能力。

当时中国处于计划经济时期。计划经济的原则是“按需生产”。“按需生产”意味着物质和服务经常不能满足需要。因为从所需的统计到生产完成有一个时间差。工业发达国家的环境问题起因于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而当时的中国应该说还很少有这种形式的环境破坏。

生产者、销售者高高在上，对购买者态度蛮横的现象是物质的长

期匮乏所致，而相反的关系则源于生产过剩。在日本称“顾客就是上帝”，尽管到中国来旅游的日本人对中国的服务之差有诸多不满，但是考虑到上述原因也就可以理解了。

随着80年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形成，中国经济取得了飞速发展。同时，环境问题也随之日益严重。正好在这一时期我在日本国内开始涉足环境问题，同时，由环境问题重新审视社会。从这一角度看中国，感到问题非常严重。

首先是发展中国家共同存在的“环境破坏与贫困的恶性循环”。加之中国文明历史悠久，问题积累得更多。我们在大同经历的各种艰辛也源于同样的问题。中国伴随着工业急速发展突发公害，类似日本经历的在高速增长时期出现的水俣病及其他公害。一次性废弃物的环境问题也快速显现出来。塑料瓶等一次性容器转眼间铺天盖地。中国的生态环境本来就很脆弱，加之诸如地球变暖、酸雨以及其他一些方面的地球环境问题，比起其他国家表现得更为突出。

我认为如果不想办法解决，问题就会更加严重。中国与日本是一衣带水的近邻，环境问题必然会影响到日本。但是水的问题、大气污染问题……很快也会变成政治问题。

我遇事轻率鲁莽，因此不可能在中国涉足这些问题，我想，搞绿化谁都不会反对，我希望通过绿化积累实绩之后再向其他领域扩展。

为了寻求各方面的合作，我在日本走访了各种团体和个人。但反响都不很理想。甚至有人说：“你没病吧？为什么要从水泥森林、沥青沙漠的大阪特意跑到绿树成荫的中国去种树？”持这种观点的人多半是了解中国的人。日本人去的多半是绿化搞得不错的沿海大城市，很多日本人只知道这些地方。

在这种情况下，我多次访问了西山五郎先生，他说“我连樱花和梅花都分不清，到那里去又有什么用处呢？”话虽这么说，他还是接受了第一个绿化合作团副团长的职务。我感到很高兴，如果没有他的参

加，代表团就无法成行。西山先生也一直担任我们“绿色地球网络”的副代表。

跑到中国去劝说环境问题的重要性多半是要碰钉子的。“这是先富裕起来的日本人一相情愿的想法，中国最大的问题是怎么解决吃饭的问题，因此发展经济是必须的。如果发展经济一定带来环境破坏，那也只能接受现实，我们有时甚至需要污染。”

后来，中国人的环保意识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我们不能忘记知识分子所发挥的先导作用。对我来说印象最深的是何博传。他写的一本书现在手头没有，记得日文版标题是《中国·未来的选择》<sup>①</sup>（NHK出版）。我们绿色地球网络的最初会员多半是看过这本书。但是这本书出版后不久就在中国国内禁止发行了。

另外民间环保组织非常活跃。在中国，民间团体独立开展活动非常困难，特别是在资金筹措方面有很多制约。我十分敬佩这些在困境中开拓道路的人们。

国外的活动也对中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代表性的有莱斯特·布朗的书《谁来养活中国？》（钻石出版社）这本书在中国引起了轩然大波，产生的影响应该予以评价。我甚至觉得知识分子如果不能够带来如此强烈的冲击力，就不能算是干工作。

远远超过上述因素的更强烈冲击是1998年长江、松花江等地发生的特大洪灾。每当长江发生洪涝时都有报道“这是百年不遇的灾害”，但是这一次中国新闻媒体明确地指出“这是人祸所致”。

到处可以听到这样的议论，“即使实现了经济发展，如果环境继续恶化的话，取得的成功也会功亏一篑。不仅如此，还会受到大自然更严厉的惩罚。”之后，中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保护环境的措施。

从那时起日本国内也开始更加关注中国的环境问题，这真让我高兴……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也说明了问题的严重性。

---

<sup>①</sup> 中文书名：《山坳上的中国》（何博传）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

中国历史虽然悠久，但在工业文明方面仍然是一个年轻的国家，要比日本年轻得多，经济方面还很不成熟。今后将有更广阔的地域需要经济开发。据说，要想保证新毕业的年轻人有工作，从微观方面比上一年有所好转的话，就必须在宏观方面保证至少 6% 的增长。实际情况是否真是这样呢？

如果连续 12 年以 6% 的速度增长，经济规模就增长 1 倍，如果是 7% 的话，10 年就可以增长 1 倍。如果是 7% 的增长持续 20 年，经济就翻两番。前不久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上提出的 2020 年 GDP 增长比 2000 翻两番的目标就是这样计算的。由于水的需求量猛增，环境负荷加重，制定的目标否能实现呢？从长远来看，能源和环境问题将制约中国的发展。

人们说，之所以增加到现在这么多人口是因为毛泽东的人口政策失误。为了弥补这一失误不得不采取独生子女政策。从环境方面考虑，现在的经济增长同样也是一种冒进。纠正得越慢，将来付出的代价就越大。这种现象给我的感觉就像是爷爷用孙子的信用卡乱花钱。

但是在经济增长时人们和社会是不会这样去思考问题的，只是一心要赚钱。日本高速增长时期和泡沫经济时期也是一样，被“日本第一”冲昏了头脑。一旦碰壁时却丧失了改革所需要的能量和精力，一蹶不振。

作为邻国人，我痛切希望中国不要走日本的老路，因为它的负面影响实在是太大了。